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与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植物园及其他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合作开展研究和考察项目,促进了研究和建园的发展,丰富了植物种类。

植物园于2000年加入植物园保护国际(BGCI),并承诺实施《植物园保护国际议程》,合作办培训班、翻译出版书籍和举办展览,加强了植物园的能力建设与公众教育。植物园与51个国家和地区的371个植物园、树木园和其他单位建立了种子和植物材料交换关系。从国外引进世界红花种质资源、优良甜高粱品种、世界鹰嘴豆种质资源的核心收集品和世界小扁豆种质资源的核心收集品近万份。组织承办了第三届国际红花会议和第一届国际甜高粱会议。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合作,进行“超干保存种子种质的研究”,在超干种子贮藏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俄罗斯植物园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濒危及野生植物迁地保育基础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研究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植物资源交换、系列著作出版、迁地保育研究。与北美植物园和树木园协会合作,引进了植物园基础数据管理软件BG-BASE和BG-Map。

与韩国顺天大学确立了合作研究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作关系,派出研究生到韩国攻读博士学位。植物园的科学家多次出访



俄罗斯植物学家与植物园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交流

## 对外工作一瞥

各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开展工作,派出研究人员和学生出国进修,并接待外国科学家来访。植物园还多次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外宾,在植物园植树纪念,或接受他们赠送的植物礼品。植物园非常重视派遣人员出国进修、科学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活

动,以达到培养人才、了解本学科最新信息、掌握国外学术动态的目的。几十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植物园派出国进修、科技考察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有一百多人次,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如原苏联、英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

### 人才培养

早期植物园在人才培养方面方式较多,但主要是“工作中培养”的原则,同时聘任高校的教授来园任导师,并定期举办讲座和参观学习。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年轻人日后大多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并为我国植物园事业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植物园建园初期是半独立性质,在业务、人事、财务(院下达经费时,在植物所经费数中注明给植物园的经费数额)和外事等方面与科学院直接发生关系,职能部门单独建制。1973年植物园恢复重建时,仍为半独立性质,人员编制从1950年初的4人发展到1978年底的250余人。1983年秋,除机务队外植物所将植物园的所属行政、后勤供应和业务保障系统的全部机构和人员由植物园划出,另组成植物所香山分部,归所直接管辖。至此,植物园变为研究室待遇,取消党总支,成立党支部,其人员编制减至130余人。

美国、加拿大等。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科技合作，提高了植物园的科学水平，增进了各国科技人员之间的友谊。

友好国家以特殊植物、特有植物、经济价值高或观赏价值高的植物作为礼品，馈赠我国领导人，以表示亲善、友好、祝福。对这种礼品要格外爱护和珍惜。据初步回忆，北京植物园接受的植物类礼品大致分3种类型：

特殊植物：例如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1956年和1962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分别赠送周总理的3株佛教圣树——菩提树。

经济植物：例如巴基斯坦赠送毛主席的芒果（毛主席送给轻工部食品所工宣队，后转送植物园）；1957年阿尔巴尼亚主席谢胡赠送周恩来总理的油橄榄；古巴赠送的矮生香蕉；几内亚总统杜尔赠送的可乐；澳大利亚友人桑迪赠送的大果无花果、肥羊草；柬埔寨赠送的木苹果；缅甸赠送的蕉藕。

观赏植物：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赠送刘少奇的‘光美’兰；莫桑比克议长赠送朱德的仙人镜；1976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送唐松、日本大山樱花各100株；越南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驻华使馆分别

赠送九重葛、凤梨等；朝鲜平壤市长赠送垂丝海棠、木槿、黄杨、连翘等数种植物，并曾单辟礼品区种植；1976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赠送热带兰，前后两次，共计130多个品种；日本友人大贺赠送郭沫若院长的大贺莲莲子100粒，分送全国10个植物园；1976年日本插花协会赠送郭沫若院长的花菖蒲，共计117个品种，211株；此外还有毛主席将韶山人民赠送的金桔送来培养，朱德委员长赠送兰花两千余盆，其中有‘张荷素’、‘墨红’等名品，董必武代主席赠送枸椽两株等。■

（责编 桑新华）



法国农科院lescout研究员访问